

海外视野

回望2022：坎坷中前行的美国高等教育

■郭英剑

2022年是美国高校逐渐走出疫情大流行的阴霾、逐步恢复常态的第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高校在坎坷中前行，持续不断地适应着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不断变化的学生需求。一年来，有欣喜也有失望，各种事件不断，但总体上看高校内外都在努力重拾对高等教育的信心。

我将通过梳理美国高等教育一些重要数据以及这一年中所发生的大事，择要回顾一下即将过去的2022年。

入学率有升有降

据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换研究中心(NSCRC)的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美国研究生入学人数继续保持相对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秋季的入学率在去年同期增长2.7%的基础上,又增长了2.1%。但今年本科生的入学率比去年下降了2.6%,而且近两年入学总人数加起来下降了7.8%。

本科生入学人数的下降自然令期望逐步恢复正常的高等教育领导者感到失望,但仔细审视统计数据,人们也发现名校的入学率在增加。

统计数据表明,在四年制大学中,名校的入学率增加了3.1%。众所周知,名校的入学要求相对更加严格,淘汰率也很高。但今年的一个亮点是,越是名校,录取率越低,学生的申请人数与入学率越高;反之,学生的入学率越低。

以哈佛大学为例。多年来,哈佛的本科生录取率持续下降,今年尤甚。根据该校的统计,今年共有61220名学生申请,但只有1954名学生最终被录取,录取率仅为3.2%。相比之下,去年的申请者有57435名,录取率为3.4%。事实上,今年是哈佛历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年。

这一事实告诉高等教育界,把学校办好是第一要义。中国古人所说“良禽择木而栖”“凤栖梧桐”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好的学校,学生自然会蜂拥而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追求也会更加强烈,名校效应自然愈发明显。

标准化考试或取消或恢复

在美国,标准化考试主要是指SA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是过去高中生申请大学的入门考试。在疫情大流行期间,由于无法开展线下的课堂测试,加之人们对于标准化有着众说纷纭的认识与见解,导致很多高校都不再对申请者提出这方面的要求。更有一些高校(特别是加州大学系统)直接废除了将传统的标准化考试作为录取标准的规定。

2020年5月,加州大学宣布经该校董事会一致投票决定,不再要求将ACT和SAT作为入学申请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如果学生申请的是加州大学系统的学校,则无须再

对于过去的一年,美国学界普遍认为,疫情大流行改变了传统大学的面貌,但高学位的价值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人们同样认为高等教育可以为学生的生活和未来增加价值,进而对高校的期望更高。

提交ACT或SAT成绩。根据董事会的说法,他们作此决定是希望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公平的录取环境。他们认为,摆脱当前标准化的测试模式,将使学生的申请得到更加公平的评估。

目前,美国已有1700多所高校在申请2023年秋季入学时,不再要求学生提交SAT和ACT成绩。

然而,与此同时,包括麻省理工学院(MIT)和乔治城大学等在内的一些大学,却在今年开始重新要求申请者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在它们看来,标准化考试是一个更公平的标准,特别是对于那些资源贫乏的高中生而言,考得好就有可能上一所好大学。

2020年,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麻省理工学院招生办主任施密尔曾宣布该校不再要求SAT成绩,但最近施密尔宣布恢复SAT与ACT作为MIT的入学要求。其背后的原因是,标准化考试可以使录取政策更加公平和透明,如有缺失,则有可能造成教育不平等,也难以预测学生在MIT能否获得成功。

是否采用标准化考试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而且不论是倡导取消者还是采纳者,或者如今要恢复者,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更加追求平等。孰是孰非,难有定论,但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为所有学生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机遇。

哪些专业与技能更受欢迎

从今年的统计情况看,美国学生的专业选择有一些变化。由于美国高校是到大二后才开始选择专业,因此,统计中包含了2021年及以前入学的学生情况。

统计表明,下列专业的受欢迎程度在持续增加。

商科、医疗保健和文科仍然是四年制和两年制大学生最常选的专业。

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这两个专业在四年制大学中都出现了同比入学率最大增幅(分别为3%和4.8%)。而在两年制高校中,心

当老师不再“老”,研究生该如何指导

■时广军

近年来,我国高端人才日趋年轻化,时常有“90后博导”之类的新闻引发热议。这些人虽然年轻,但已然有了“导师”身份。

与此同时,这些年轻导师与学生似乎也越来越近,他们有着同一时代的喜好,穿着、聊天也没有太大代沟,导师形象也不再传统。

随之而来的,导师与研究生间的指导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谈起“导师”,人们首先会联想到中国传统的“老师”一词。古时,“老师”中的“老”有年资深之意,“师”则是指传授技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师者似乎该有岁月沉淀的底蕴。而“90后博导”所折射出的导师年轻化,则似乎少了点“师”该有的老者韵味,缺了点“代”的感觉。

《论语》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如今“老者为师”更多是被“长者为师”所替代。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更像是先跑者引导后跑者,他们不必是一代与一代的分割关系。

“师徒式”到“期望式”

在我国千年的师徒传统中,“拜师学艺”是习得独家绝活的诀窍。这种方式适应了“小作坊”、近地缘的传承关系,老师傅也能以自身优势指引徒弟。但如今,诸多知识技艺不再是高度封闭的单向传递,导生更需要合作共赢,实现期望。

在这方面,加拿大研究生的“期望式”指导有其可借鉴之处。

在七国集团(G7)中,2018年加拿大各级教育中的国际生比例均高于美国、德国、日本,其生源背景的差异也很大。2020年—2021年,加拿大高校全职教师约4.2万人,同

期美国高校全职教师则超过72万人,加拿大国内导师数量面临短缺。2020年底,加拿大近79%的劳动力从事服务性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等,时代不断更新服务性行业的需求,不再限于传统技艺传承。在国际化、导师短缺、新市场需求等趋势下,加拿大探索了一条“期望式”的导生指导途径。

“期望式”是导师与研究生间建立可行期望、共同奋斗、主动进取的指导关系。当然,这种“期望”不能违背国家和学校的基本制度规范。

一是期望内容上观照“多样化”的福祉需求。加拿大提倡人生引导、多样化需求,而非仅限于学位。多伦多大学在其《导师指南》中指出了“Supervision”与“Mentoring”的区别,前者有层层监督之意,后者则侧重方向指导,在学校实践层面,导师与研究生大致建立三类期望内容——学术性、专业性与人伦性。界定“期望”其实也就是明确目标,不过这种目标更具包容力,需要学生更加主动。

二是期望形式上留下可循“痕迹”。不同于口头承诺,加拿大高校倾向于通过文本、电子记录、事物标识等形式,记录导生期望的实践痕迹。

具体而言,共包括四类“痕迹”。期望协议,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官网提供了“期望模板”,鼓励师生进行协商并达成共识;时间进度表,将课程、例会、开题、成果提交日期等进度明确下来,化为可视文稿;过程互动记录,以文本或电子等载体记录日常有关的交流、反馈等;阶段性进度报告,定期对研究进度进行总结并提交。留下“痕迹”既提供了一种改进证据,也是一种督促。

三是以“沟通”为纽带进行实施。不同于制度强制力,“期望”源于导生共识,它是建立

理学和法律专业则是仅有的两个增长的专业领域(分别增长0.8%和4.8%)。

在研究生教育中,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及各种支持服务类型的学位课程(如银行与金融行业支持服务专业、牙医支持服务专业、学生支持服务专业等)的入学人数在2021年秋季增加了近20%。

在调查中,人们也对高校该提供怎样的教育,以及哪些技能更为重要作出了回应。

62%的成年人认为,高等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非常重要,只有这种教育才能为他们长期的职业成功做好准备。

人们普遍认为,在职场取得成功最为重要的技能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68%);第二位是有效的沟通能力,例如写作和口语技巧(64%);还有40%的学生表示,拥有更灵活的学习选择非常重要。也有超过一半的Z世代(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那一代人)(52%)表示,他们会大力支持致力于促进种族平等的高校。

众多大学“换帅”

今年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许多大学校长宣布卸任。仅今年一年,美国就有数十所高校进入校长换届期,大量现任校长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离开校长职位。

4月14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宣布,他将在2022—2023学年结束时,卸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职。从2002年上任到明年卸任,在任21年的他,成为了现在美国八所“常青藤盟校”中任期最长的大学校长。

6月8日,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巴科宣布,他将于2022—2023学年期末卸任校长之职。随后,哈佛进入遴选新校长的阶段。

就在不久前的12月15日,哈佛大学董事局宣布,任命该校现任文理学院院长克劳丁·盖伊为第30任校长。盖伊是海地裔美国人,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有色人种校长,也是第二位女性校长。她将于2023年7月1日走马上任。

据统计,美国现在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大学校长是有人种。大学校长中的女性比

在相互沟通基础上所生成的规范力。在这一点上,加拿大高校普遍建议导师与研究生尽早进行期望沟通,如卡尔加里大学设计了“期望检查表”,供导师逐条反思是否进行了相应交流并达成共识。另外,他们还注重以一对一、合作小组、会议等方式定期会面。

四是期望的标准上回归“专业化”。导生的期望共识并非是非业余和杂乱的,而是旨在更好地促进学生智力、学术、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此,我们应探索现代理念的中国式研究生指导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在应对生源差异化、导师精力有限等问题上,照搬“期望式”模式并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是导师指导研究生应有的样子,但该模式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我国传统的“师徒式”在一对少、近距离帮扶和人文关怀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为此,我们应该探索现代理念的中国式研究生指导之路。

在我国,延续千年的中华文明是现代指导方式的重要基因,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指导也不能脱离中华本土的文化、精神、情怀等,而要继承“师徒”传统中美好的品质。年轻导师应继承“老师傅”的优良传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期望式”中合作、主动等指导特色。

探索符合国情的研究生指导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在应对生源差异化、导师精力有限等问题上,照搬“期望式”模式并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是导师指导研究生应有的样子,但该模式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我国传统的“师徒式”在一对少、近距离帮扶和人文关怀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为此,我们应该探索现代理念的中国式研究生指导之路。

在我国,延续千年的中华文明是现代指导方式的重要基因,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指导也不能脱离中华本土的文化、精神、情怀等,而要继承“师徒”传统中美好的品质。年轻导师应继承“老师傅”的优良传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期望式”中合作、主动等指导特色。

例也只有30%,其中大多数是白人。因此,盖伊当选为哈佛这样一所历史悠久而复杂多元的高校校长,自然具有了标杆意义,应该会成为其他高校树立榜样。

霍华德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在任职近10年后,于今年4月对外宣布希望在2024年6月退休。波士顿大学9月宣布,该校校长布朗将在任职17年后退休。

另外,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纽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俄亥俄大学、鲍登学院、哈佛·穆德学院、史密斯学院和圣奥拉夫学院也都在今年遴选校长。在今年9月前,达特茅斯学院、西北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刚刚结束了新校长的遴选工作。

美国最大的猎头公司之一艾萨克与米勒公司的创始人约翰·艾萨克森从事该行业已有25年。他说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校长卸任,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它,但他认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也有人将如此多的校长离职的原因部分归咎于疫情大流行——某些原本在两三年前打算退休或辞职的大学校长,因为疫情的缘故留了下来,以保证其所任高校能安然度过疫情大流行的最严重时期。现在疫情基本已经过去,到了他们要休假的时候了。而其他一些原计划再任职几年的新校长,在与疫情大流行打了几年交道后,正在加速离任的时间,因为他们普遍感到精疲力竭。

大学校长作为一所大学的掌舵人,对于高校未来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今年大规模的校长更迭必将对美国未来的高等教育产生一定影响。

基金资助助力高校转型

今年9月,盖茨基金会宣布将在5年内斥资1亿美元,通过美国州立学院和大学协会、美洲印第安人高等教育联盟等六个中介组织,致力于帮助大学转型,解决入学率下降、工人的再教育需求增加,以及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下降等问题。

盖茨基金会希望通过此次捐赠,彻底改革大学的商业运作模式、结构和文化,并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其成果可以通过高校的毕业率和从社区大学成功转学到四年制大学等指标进行衡量。此外,该基金会还希望努力帮助高校解决教育公平等问题。

美国的慈善事业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盖茨基金会的此次投入虽然不算太大,但由于涉及面广,应该会对高校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于过去的一年,美国学界普遍认为,疫情大流行改变了传统大学的面貌,但高学位的价值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人们同样认为高等教育可以为学生的生活和未来增加价值,进而对高校赋予了更高的期望。

即将到来的2023年,高等教育将会进一步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未来可期。

比如在目标的设定上,导师与研究生的第一属性是“人”,“师生”属性是后天产生的。现代指导方式要以人的福祉为先,除了素质与能力的业务指导外,也不能忘记人的多样需求与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的福祉”观应是双向的,在导生交往中,要看到彼此的情感、幸福、尊重等“人”的期望,而不是简单的训诫、完成任务等“师生”教条的期望。

同时,要以不断“发展”为引擎。“发展”意味着向美好状态前进,这是导师与研究生指导关系的内在动力。在这方面,我们既没有必要苛求有一位无所不能、绝对优势的“师”存在,也不需要有一位处处弱势、被动等待的“生”存在,即使“90后博导”没有老师傅的经验视野,但只要在某领域能与研究生产生合理发展的可能,就可以形成指导关系,甚至合作共赢。只要能朝着目标发展,导生之间指导可以是多样的。当然,这也需要学生更有主动性。

此外,在当下的导生指导关系中,“小作坊”的方式显然已经力不从心,而是需要打造出一套共识体系。在此共识下,师生之间能自我约束,相互提醒,不过要减少通过明文规定形式建立共识,而是尽可能基于日常的规范、默契,形成一种文化生态。

当然,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要在特定方面给出约束,树立权威,研究生要主动进取,有责任感,发挥自身优势。双方也不能离开基本的伦理情感义务,以免成为精致的功利主义者。有了尊重、感恩的导生指导关系,才能产生更多认同感,也才能有源远流长的传承。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中国乡土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大学评论



李锋亮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特聘教授

最近,国际知名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全球40%的博士生和28%的硕士生曾就学业压力造成的抑郁或焦虑寻求过帮助,研究生罹患抑郁和焦虑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高出6倍之多。

众所周知,抑郁和焦虑会降低研究生的生产能力与效率,严重的还会导致其无法正常学习与科研,甚至发生悲剧。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国际冲突热点频发、经济发展态势不明朗,势必会迅速传导至研究生教育领域,进一步增加全球范围内研究生的压力水平。

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作用也不断凸显,主要发达国家均把研究生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如果研究生普遍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显然会削弱研究生教育对国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那么,我国研究生个体的心理压力水平如何?

笔者所在的团队通过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研究生自我感知的心理压力程度比较高。其中,11.2%的样本认为自己当前心理压力非常大。这和国际上的情况是相似的,我国的研究生心理压力也在一个较高水平。而且,我们的数据还显示,博士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显著高于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压力,这也和《自然》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既然我国研究生的心理压力处于较高水平,就有必要分析哪些因素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进而在保障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的情况下,通过有效措施降低我国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水平。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行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研究生的学业、科研、就业、思想等负有全过程指导的责任。2018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提出了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包括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优化研究生培养条件、注重对研究生人文关怀等七项内容,更强调了导师对于研究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然而在现实的培养过程中,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相处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时导学关系困扰也会成为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源之一。因此,非常有必要分析导学关系与导师指导行为对研究生心理压力的影响。

经过研究,笔者的团队有了如下几个发现。首先,将学生当朋友的导师所指导的研究生,其心理压力明显更低,这也印证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其次,导师对学生在生活方面的关心有助于降低研究生的心理压力。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正确性,说明导师不仅要当学生的学术导师,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父母的职责,像父母一样关爱学生的方方面面。最后,导师如果为学生构建社交网络,也可以显著降低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将对学生持续关心形容为“扶上马,送一程”。而导师帮助学生构建社交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就属于此类,有助于研究生未来的长期职业发展。

基于上述发现,笔者建议构建中国式导学关系,以缓解目前研究生较为普遍的心理压力。

已有研究认为,和谐的导学关系可能会被短期功利主义所严重侵蚀,进而蜕变为压迫关系、雇佣关系、疏离关系,由此导致本应成为良师益友的导师反而成为研究生的压力源。因此,将导师称为“老板”的现象需要重新被审视甚至被纠正,进而倡导建立良师益友型的导学关系,降低研究生的心理压力。这有利于在促进研究生身心健康的同时正本清源,确立更加具有人情味和道德元素的导学关系。

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导师立德树人的作用。导师因其在导学关系中的先赋权威地位,对研究生具有强烈的影响力,这就要求其必须在对研究生进行指导的过程中,始终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将培育研究生成长成才作为一切指导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不能仅限于学习、工作与科研,导师还必须加强对研究生的人文关怀与价值观塑造、关心研究生未来职业发展等问题。

此外,还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萃取更多构建和谐导学关系的元素。既然“良师益友”“扶上马,送一程”均有助于显著降低研究生的心理压力水平,可以预见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有许多有助于构建和谐导学关系的宝藏。研究生教育的研究者、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去探索、挖掘、提炼、应用、推广中华民族优秀的师生与导学观念,进而构建并形成中国式的导学关系。

相信中国式的导学关系将为全球研究生心理压力的缓解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缓解研究生心理压力需构建中国式导学关系